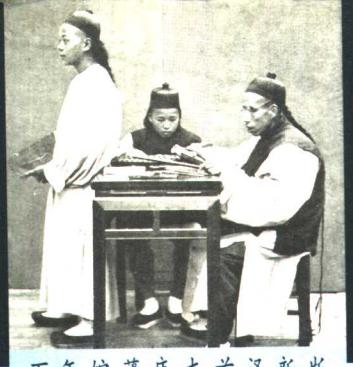


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



百年馆藏库本首译新版

#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THE LAND OF BLUE GOWN

[英] 阿琦波德·立德 著  
王成东 刘皓 译

时事出版社

主编

黄业





国防大学 2 065 4289 2

6-071-62  
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

#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英] 阿琦波德·立德 著

王成东 刘云浩 译

时事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英)立德著;王成东,刘浩译 . - 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1

(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

ISBN 7-80009-488-X

I . 穿… II . ①立… ②王… ③刘… III . 城市 - 风俗  
习惯 - 概况 - 中国 - 清后期 IV . K89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8085 号

###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英]立 德 著

王成东 刘 浩 译

责任编辑:祝勇

策划文案:野夫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编:100081)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25 字数:17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8.80 元

## 序 言

戴逸

中国被西方所认识并纪之以书，大抵应从《马可·波罗游记》算起；其后的利玛窦更以“西儒”之身份撰写了多种著作，力图在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之间寻找到结合点。在这些著作的影响下，十八世纪的欧洲汉学界充满了对中国社会理想化的描述；与此同时，欧洲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和亚当·斯密亦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华夏这个古老的文明。有的赞美这一古老文化，以为可成西方的借鉴，有的则鄙视中国，揭示其停滞不前的传统原因。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中国观”逐渐得以形成。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在席卷世界的近代化浪潮中被抛在了后面。于是，国门被坚船利炮轰开，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时代由此开始。

结束这样一段痛史，迄今已近半个世纪，今世的人们对于那一时代的认识，往往仅限于教科书和一些演义化的影视文艺，而缺少更生动更真实更细致的资料作为参考。事实上，随着当年舰炮而进入中国的，还有大批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外交家等等。这些人在中国居留甚久，对中国文化和社会有着不同程度的了解，当然也有着迥异于国人的视角。他们通过自己的多方观察和体验，分别写出过许多有关中国社会各个侧面的专著，对西方人认识中国产生过巨大作用。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著述一直湮埋于历史的烟尘之中；我们只能从鲁迅、潘光旦等老一辈学人的引用、赞叹和批评里，隐约遥想这些著作当年的影响。

现在，一批青年学人本着重新认知和借鉴西方“中国观”，借以追溯中西文化交流和文明冲突的历史，以便更清晰地了解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这一目的，从库藏旧版中译出这套丛书，命之为“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这实在是一件

深具意义的事。从首期推出的这一套四种译著来看，这些原著都成书于清末，真实地记录了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各层面的状况，并附有大量珍贵的旧照片。总体来看，这些作者对中国还是较有感情的；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方面也确有贡献。具体而言，他们在中国的居留岁月里，也提出过一些友好和善意的建议，比如主张戒除鸦片，反对缠足，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以及提倡改革教育制度等。

毋庸讳言，由于文化隔膜及未能深入准确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书中难免存有一定的偏见和错觉。因此，某些仅凭粗浅的认识即信口开河妄作解人的观点，多少便带有自大张狂和民族歧视的痕迹。至于这样一些故意夸大他国族性弊端的微词非议，或者有目的地宣扬宗教思想的传教士腔调，只能昭显出作者的狭隘和时代的局限，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一个雄据于东方，充满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民族，已经丝毫无损，我们已有足够的度量来回顾已为陈迹的一切。

出版编辑这样一套译丛，有选择地引进介绍一批在西方社会影响巨大的有关中国观的经典著作，我以为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有利于促进国内近代文化史、社会史及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对于拓展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范围和深度也将起重要作用。再者，书中也存有许多善意的批评和中肯的建议，即使百年之后来回顾这些意见，仍具有一定警醒价值。如果能积累有年，持续不断地编译下去，将是一项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出版工程。我希望这套译丛能够多出一些，出全一些，不企望一次性完成；同时在著作的选择方面下大功夫，争取能集萃最具经典性的作品。从中我们可以审视历史，温故而知新，最终达到提高我们民族素质的目的，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所警示的那样：“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 “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主编前言

黄兴涛 杨念群

十多年前，当中国再度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钟叔河先生主编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旨在展示近代中国人最初步出国门后，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它以深沉的历史感，丰厚的文化内涵，给读书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温馨的记忆。那无疑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文化出版工程，至今，我们仍然期待着它还能够有新的延续。

但是，中国融入世界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意味着世界走向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过程中，外来的人们还表现得更为“主动”。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当中国人远渡重洋，以惊奇的双眼观察世界的时候，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也飘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他们用异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块陌生的国土及其生活在里面的芸芸众生，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留下了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等方面之形形色色的观感、研究和评论。无论是从历史研究、民族交往、文化交流，还是中国民族的自我认识等多种角度来看，这些著述都不该是封存于库的资料，而是有待开发、内容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虽然，在那中国人备受欺压的岁月，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但其中也不乏认真观察、深切体会、既具有洞察力又深怀同情心的明智之作。作者或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或是为清政府所雇佣的官员、教习和科技人员，或是外国在华报刊及西方各大报派驻中国的记者，或是考察、游历中国的作家、学者、律师和商人。其角色种类之繁，观察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内容之细致深入，总体说来均远非同时期观察西方的中国人及其有关著作可比。正是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观察者所写下的为数众多的著作，从而建立起了当时的西方世界里关于中国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又构成今日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历史底版，并反复不断地被现实冲洗出新的照片。

浏览西方人关于近代中国的各种著作，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观察记述，确有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独特之点。相当一部分是对基层社会的记录，多系亲见亲闻，显得别致细腻，足以成为可补中文记载之阙的正史资料；尤其是对方兴未艾的近代社会史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史料价值。

当然，西方的中国形象毕竟是西方人自己建构的。他们的眼睛里嵌着自身历史文化的瞳孔，因此对中国的反映有真实的一面，也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有受其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左右，优先摄取或夸大反映的部分，也有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盲点”。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借中国这壶“老酒”，去浇他们自己心中的“块垒”。在这种情况下，其所记所述、所议所论，也就只有文化传播的意义了。

认识一个民族及其文化是一件复杂而长期的事情。无论

是认识者还是被认识的对象，都会受到历史和现实因素的种种制约，且自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连西方学者自己也感慨，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及其文化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总在不断地变化着（见英国汉学家雷蒙·道森著《中国变色龙》）。19世纪中叶以后至20世纪前叶，是西方中国观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已不再像18世纪时那样美妙，令中国人揽镜自照之下，爽心悦目之感油然而生。而是观之不免既惭且愤，由此生奋发图强、赶超雪耻之念。如今，中国人的“汉唐气魄”正在逐渐恢复，坦承这种形象变化乃是西方认识中国逐渐深化的表现，或至少是其认识中国走向深化的必经过程，大概不会太显唐突。其实，我们怎样看待它并非至关重要，最重要的在于，它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一种曾影响中西交往且至今仍影响着这一交往的历史文化因子。大凡健全自信的民族都是会正视且研究这一历史现象的。

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好比是一面历史的镜子，照一照这面西洋镜，从中领略生活于中国本土意识之外的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了解我们在西方的形象变迁史，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反省和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在现代化建设和国际交往中，增强自我意识，更好地进行自我定位。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借别人的眼光加深自知之明”的意思。

目前，国内学术界比较重视对西方汉学专门研究成果的译述。其中，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海外汉学丛书》，是较有影响的两种。它们向国人介绍了不少当代西方和日本一流的汉学研究著作，资为国内学者学术研究的借镜。而我们这套丛书，则主要选择19

世纪中国国门被打开后，来华西人综合记述中国社会政治制度，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民族性格等具“宏观性”而又不那么古板学究气的各种著述。我们的选择标准是：它们曾经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对西方人的“中国观”产生过一定影响；作者眼光独具，经历丰富，观察细腻，议论有味，总之生动可读。与此同时，丛书也包括了一些后来的西方学者对欧美“中国观”予以分析研究的总结性著述。但愿这套丛书对国人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和西方人的中国观，能够有所裨益。

1997.12

# 目录

1. 一访北京：围城之前	1
2. 引航镇：大沽	17
3. 八月在烟台	29
4. 上海的城墙	43
5. 上海	55
6. 中国农村	69
7. 宁波的春天	83
8. 九月在芜湖	101
9. 宜昌——龙王洞和龙丘	113
10. 丰都：中国的冥府	127

# 目录

11. 报酬微薄的传教士	139
12. 距上海一千五百英里的农村	157
13. 中国西部的反洋暴动	211
14. 对进一步暴乱的警惕	229
15. “坏”温塘	243
16. 四川边境的部落	257
17. 餐桌的布置	275
18. 传教士在做什么？	285
19. 反对裹足之行	301
20. 反对裹足之行	323

# 1

## 一访北京：围城之前

从北京回到天津，我就一直认为，在所有我到过的地方中，北京是最奇妙的。回到天津，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新修的铁路和火车头。同欧洲相比，这铁路和火车头只能算小孩的玩艺，但仍使我们感到恍若穿越了好几个世纪。要知道，三天前我们还骑着马儿颠出北京城。天津，尖利的汽笛声中，铁匠们在打铁，水兵们赶着马和驴走在英国式的河堤上。领事馆门外，真真切切地停着一艘飘扬着皇家海军快艇中队舰旗的军舰。三天前，我们用褐色的双峰骆驼驮着行李离开北京城时，每次呼吸都让人觉得，那是不讲公共卫生的时代。在北京，除了公共卫生设施的最新发展——大多数城门外都有的化粪池外，几乎没有

别的卫生设施，不要说下水道了。虽然气味让人怀疑北京是城市还是乡村，但化粪池本身作为公共卫生设施的最新发展，已经让人很欣慰了。

伦敦以及充斥伦敦的新玩意——美学、卫生学、社会经济学，使我十分厌烦。对那些与我有同感的人来说，去北京旅行是最令人振作的了。治病良药奎宁，吃起来也很苦的。北京也是这样。阳光下熠熠闪光的皇家楼阁的琉璃瓦，在汉白玉桥周围，甚至在煤山上都能见得到。除此以外，北京还有许多令人为之一振的东西：牌楼、小亭儿、明净的空气——在这明净的空气里，泥墙也很美。牌楼上盘着威严的金龙，深蓝色、鲜绿色和朱红色的十分和谐。几百年来，中国妇女们都穿着在西方只有男人才穿的长裤；她们穿旗袍而不穿裙子。我们混迹在这些最安分的人里，他们是如此顺从，随时准备为乘坐八抬大轿的官员和骑马的侍卫让路。

我们乘船沿着白河缓缓地顺流逆风而行，同船的是一位候补道台和他的随从。道台双颊灰白，一个劲地吸烟，毫无表情地看着我们，一言不发。无论怎么看，在那个世代袭官的显贵家族中，他都是最虚弱的子孙。我们提醒自己，与我们同行的是一位官侯，一位等待任命的官侯。

人们通常只看事物的表面，而我们连北京大考场的外表都还没有看到。三年一次的全国科举考试就在这个考场中进行，中国的男人们在考试中追求最高的功名，成功者的名字将被刻在大石碑上，永远供后人瞻仰。

中国最奇特的事物之一就是这种考场。虽然它仍然是中国最出色的男人们赢得功名的地方，但这种考场给人的

冷落和遗弃感，要远甚于意大利的古罗马遗迹。在意大利，走进异教的庙宇，尽管已经几个世纪没有举行宗教仪式了，但与中国的庙宇相比，更像是宗教仪式一直没有断过。北京的庙宇中，现在，至少在围城之前，每年要举行两次盛大的仪式。就我所知，阿波罗和丘比特在欧洲受到的待遇要比释迦牟尼和观音菩萨在中国高得多。此前，在中国其他地方，我都没发现哪怕是规模最小的宗教仪式。

也许，中国人仍然信奉佛教、儒教或道教。在中国住了几个月之后，我对此的信任度大大下降了。在中国，除了庙宇和神像之外，没有任何宗教的踪迹。如果庙宇和神像就是宗教，古罗马就是多宗教国家了。我在伦敦时曾给外国人作过导游，参观过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前英国国会所在地，英国国会分院长老院，也称上院；和平民院，也称下院）。我们去平民院时，祈祷还没有结束，议员们正在祈祷。外国客人中没有基督徒，但祈祷的庄重和肃穆还是深深地感动了他们。一个活泼的德国女游客悄悄地问：“能用小望远镜看一看这些漂亮的建筑吗？”在孔庙里，谁会因为使用一个小望远镜而犹豫呢？随后，我们去参观长老院，但连往里看一眼都办不到，因为议院的长老（议员）们还没有作祈祷。一位警察说，祈祷结束之前，任何人都不得往里看。“每天都这样作祈祷吗？每天？”一位瑞典教授严肃地问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得不说，英国是一个奇妙的国家。”

最使我惊奇的是中国人对法规的漠视。这一点在旅居中国的欧洲人身上也滋长起来了，充分地表明了这种漠视多么符合人的本性。例如，在中国，我听到一位西方妇女

说她星期天去野餐了。我一生主要是在外国度过的，但直到来到中国，我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在这里，星期天去野餐是规矩，而不是例外。她们争辩说：“星期天是休息放松的日子。”在烟雾弥漫的利物浦或伦敦，这句话会更有力。文明世界里，哪个欧洲人的教堂像在中国那样人迹罕至？我经常想起一位海关检查官的话：“与其说是英国人在努力使中国人信奉基督教，不如说是中国人大声地让英国人放弃了基督教。”面对大车店一样住着各色人等的北京，我在想，这难以捉摸的影响力到底是什么？它征服了征服者——满族人。一眼看去，一切都那么令人无可奈何地感到格格不入和反感，北京现在的状态简直是一个可怕的榜样。

人们说：中国人不关心别的，只关心钱；中国人不讨论别的，只讨论钱。这能解释一切吗？到现在为止，我还无法看出，除了钱之外，欧洲人还想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些什么。那些被派去教导中国人“爱钱是万恶之源”的传教士，看来也大多沾染上了对钱的嗜好。

北京有很多迷人的花园。我们路过的时候，花园里鲜花盛开，每个从花园出来的人，手上都拿满了晚香玉花。前门（也是正门）周围弥漫着香味，香味来自一排排等待出售的小树。中国人欣赏花似乎只是为了花香，他们只喜欢香味浓郁的花。中国人十分幸运，他们的嗅觉器官只能对引起愉悦的气味起反应，对那些使人不快的气味，他们似乎懒得挪动他们的鼻子。

从城墙上看，北京像个大公园而不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城里到处是树。许多宫殿前都有一排排郁郁葱葱的

树，每个院子里至少有一棵，大的庭院则几乎栽满了树。事实上，如果北京是像它规划的那样——或许它曾经就是那样——我想不出有比北京更雄伟的城市。北京城的总体规划规模宏大，特别是站在钟楼往鼓楼或站在鼓楼往钟楼看，其透视和比例的安排极佳，既有距离感又注重细节。钟楼上有个阳台，本身并不很出色，但从布局看，是我所见过最壮观的阳台。在英国人尤其欠缺的方面，蒙古人确实非常出色。我们的法院和新帝国学院的选址，忽必烈大汗是永远不会批准的。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规划得比北京更宏伟，它的骨架庞大而壮观。作为历史的遗物，北京城极其引人入胜。我们知道，大人物往往在庄严的宫殿里，他们伸手可及的是豪华而不是舒适。他们很少想到外出，即使外出，也带着一排排的侍卫。侍卫们把平民百姓赶开，惟恐他们的呼吸玷污大人物的尊严。能够想象，一些心地善良的妇女或思想开放的年轻人从他们的轿子里，或从马车的帘子间，带着极大的同情和遗憾看一眼这些平民百姓。这些老百姓，肢体不全，身上长着疮，衣服破破烂烂仅能勉强蔽体，却用他们的保守和落后去抵制任何改变他们处境的努力。北京的街道上似乎到处都是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可能都是大人物的食客，他们随时准备与人吵架和打架。那些娇贵的大人物，他们的庭院中到处都是树，在能遮风挡雨的大庭院中，他们的怜悯很快就会消失，变为厌恶和无动于衷。有时，街上的马车里会有一两个满族妇女，她们面目清秀、矜持，脸上挂着和善的微笑。她们善良、安详，兴致很高地看着这个城市和它的道路，就像中世纪或世界历史中我们熟知的那些人物一样。

历史并没有告诉我们忽必烈大汗和他的继承人是否曾经使这个城市很清洁，或者说适当地管理过这个城市。但是，北京城留给我们的只有深深的遗憾：构思完美、规模宏大的北京城竟然会如此破旧。

回通州的路上，我的遗憾变成愤慨以至愤怒。通州的大街凌乱不堪，到处是垃圾，印满了杂乱的车辙。马车走在街上颠个不停，像大海中的一叶孤舟。马和骡子在前面吃力地拉，后面推车的汉子光着上身，古铜色的强壮身躯俯在车轮上竭力地推。年复一年，他们就这样拼命、挣扎，把沉重的马车从本不该存在的车辙中推出来。强壮、甚至有些野蛮的人类在做这么简单、原始的工作，令人悲哀。没人怀疑体力劳动的高尚，但体力劳动必须用于恰当的用途，而不是无谓地消耗。通州的路该修了，路修好了，这些人和他们的马、骡子与现在一样流汗，付出相同的劳动可以去做能给他们自己和别人带来百倍利益的事，那该多好！我看到的是疤痕累累的身体，早熟的面庞和粗俗的举止。孩子们面容惨白，头上生着疮，眼睛也不好。人们都说中国的穷人并不痛苦，他们无忧无虑，生活中充满了笑声。黑奴的生活也充满了笑声，但谁愿意作黑奴，或者与贫穷的中国劳动人民交换位置，像他们那样承受众多人为创造的苦难的折磨呢？日甚一日，中国穷人的境况使我感到压抑，造成困境的不是气候、土壤和他们的品格。如果政府支持，很快就会有人认为修路值得一试。他们会整修道路，清除数不清的交通障碍，把路管理得井井有条，所有这些都会给进出北京的欧洲人带来惊喜。

在阿尔马非，我仿佛走入了中世纪。那里的街道通常